

III

资本主义世界

经济大扩张的第二个时代

18 世纪 30 年代—19 世纪 40 年代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著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V.3

The second era of great
expansion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1730-1840s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现代世界体系

第③卷

现代世界体系

第三卷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扩张的第二个时代
18 世纪 30 年代—19 世纪 40 年代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著

孙立田 丹拥军 王崇兴

张永胜 刘 疆 李友东

庞卓恒 李节传 等校

庞卓恒 主译兼总审校

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图字:01 - 1999 - 3650 号

COPYRIGHT©1989, BY ACADEMIC PRESS, INC.

中文版©2000,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本书根据学术出版公司 1989 年版译出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 System V.3

The second era of great expansion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1730—1840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世界体系 第三卷/[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 庞卓恒等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ISBN 7 - 04 - 008864 - 9

I. 现… II. ①沃… ②庞… III. 资本主义经济 - 经济史 -
世界 - 近代 IV. F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4954 号

现代世界体系 第三卷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著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 55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 - 64054588 传 真 010 - 6401404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排版中心

印 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版 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19.625

印 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00 000

定 价 34.9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工业与资产阶级	1
第二章	中心区的斗争——第三阶段： 1763—1815	78
第三章	广大新地区向世界经济体的融入： 1750—1850	181
第四章	美洲的非殖民化历程： 1763—1833	272
参考文献		363
索引		540
后记		621

第一章 工业与资产阶级

“事情越说越离奇。”

——埃里克·克里吉(Eric Kerridge)¹

我们通常习惯于围绕着一些被视为基本常理的中心概念来建构我们的知识体系。工业的兴起和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兴起就是这样两个概念，它们是 19 世纪历史编纂学和社会科学留传给我们用以解释现代世界的两个概念。其要点就是，在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大不列颠的“第一次”² 工业革命和“具有垂范意义”³ 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在此期间发生的。毋庸置疑，这样一个已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认识，一直受到不同观点的挑战。有关两场革命的细节也一直存在争议。尽管如此，这两场革命的形象还是在大众文化和学术思想两个领域里站稳了脚跟。⁴ 事实上，这两个概念如同指示方向的北极星，我们通常借助于它们在现代历史王国，这个迷雾笼罩而又水流湍急的领域中航行。实际上，正如我将要指出的那样，这两个指示方向之星其实只不过是一回事。

在我们看来，“革命”这个术语意味着突然的、急剧的和广泛的变革。它强调事物发展的非连续性。绝大多数使用“工业革命”概念的人无疑也是指的这个含义。⁵ 科尔曼(Coleman)把工业革命称为一场“引发工业化社会的比较急剧的、猛烈的变革”；⁶ 兰德斯(Landes)将工业革命称为，“人类自发明轮子以来出现的比以往任何突破都更为剧烈的突破”；⁷ 霍布斯鲍姆(Hobsbawm)同样坚持认为：“如果发生在或大约发生在 18 世纪 80 年代的这场急剧的、根本性的转变不是一场革命，那么‘革命’这个词就没有常人所理解

的那个含义了”。⁸

所谓的工业革命的含义是什么呢？汤因比（Toynbee）（正是他对工业革命作出了经典性的分析）在 1884 年的一部著作里，认为工业革命“本质”在于，“以竞争取代了中世纪的各种规章条例”；⁹ 80 年后，哈特维尔（Hartwell）在一部著作里，为工业革命的“本质特征”赋予了多少与汤因比不同的含义：“这一时期无论国民总产出或人均产出的增长率，都持续提高了，而且增长的速率与以往相比是革命性的”。¹⁰

可以肯定，强调摆脱“中世纪”的束缚（或称社会革命）与强调产出增长率（或称经济革命），两者并不矛盾。实际上，传统观点的核心一直认为后者是由前者造成的。但是，由于近年来接二连三出现的各种因素，迫切需要对增长率问题作出解释，结果后者反而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并不使人感到奇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持续发展，引起国民经济发展观念不断膨胀，把它视为根本性的共同任务，把那样的发展定义为国民经济的增长，而且相应地视之为一个真正的“定理……即只有通过工业革命才能走向富裕之路”。¹¹

“增长”和“自由”这两个所谓“根本性的”因素的含义，仍然过于模糊，需要把它们转换成含义更加明确的概念。“增长”似乎在概念上与“将机械原理应用于制造业”¹²——法国人通常称之为“机械化”（machinisme）¹³——密切相关，至于机械化“革命”的发生，则通常被归因为“熊彼特（Schumpeter）所说的一系列革新”。¹⁴

对机械化的分析，必然促使我们把生产力发展问题置于最引人瞩目的地位。另一方面，“自由”（或称社会革命）的增长则主要指生产关系：谁将生产什么产品，谁为谁工作，在什么条件下工作。工厂（机器集中的场所）和无产者，或称工资劳动者（即工厂雇工）这两个现象是这方面讨论的中心问题。据称，现代工厂“于 18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诞生于英格兰”。¹⁵ 在许多作者看来，只有工厂及其在劳动力组织方面的全部含义，才被认为是需要付工资

的劳动力在劳动组织上的关键性革新。霍布斯鲍姆坚持认为，工业革命“不单纯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而且是由于并通过经济和社会的转变，带来增长的加速器”。¹⁶“转变”首先意味着城市无产阶级的兴起，城市无产阶级本身又是“乡村社会结构彻底转变”的结果。¹⁷

有关工业革命的大部分讨论，虽然都认为它包括机械化和“解放”即无产阶级化这两个过程，而实际上却集中在下面这个问题上：是什么原因使这两个过程“首先”发生在大不列颠，是什么原因使大不列颠“起飞”的？尽管人们对罗斯托（Rostow）详细阐述的假设或分期说存在激烈争论，但“起飞”作为一个形象性的描绘，还是比较恰当地反映了工业革命的基本模式。关于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大不列颠这个问题，一直有许多种解释，虽然不同的作者强调其中的某一既定因素起着主要作用，而别的作者又加以反驳，但那些解释绝非彼此水火不相容。如果我们把那些因素按年代顺序依次排列，并加以追本溯源的话，就会发现日益增长的需求因素（人们认为这使得实行机械化和无产阶级化变得有利可图）：可用的资本（它又使机械化成为可能），人口增长（它使无产阶级化成为可能），农业“革命”（它使人口增长成为可能）以及先前的土地占有方式的演变（它使人口增长成为可能）。再进一步追本溯源，还有一个最难以确定的因素——所谓的思想态度（该因素可以保证社会上将存在企业家，他们会利用工业化进程在其发展的众多环节上提供所有的机会，这样，累积的效果是“革命性的”）。显然，把这些因素纪年化有点儿抽象，而且不同的作者主张不同的顺序。

以需求解释技术革新的原因是一种古老的理论（“需求是发明之母”），兰德斯的分析就是以需求为核心的：“在不列颠，很大程度上是需求对生产方式造成的压力，才唤起了新的技术”。¹⁸那么，是什么需求呢？有两种备选答案：对外贸易和国内市场。外贸出口论主要强调这样一个事实：18世纪后半期，对外贸易的增长

及其增速与国内工业生产的增长和增速比起来,“显然大得多”。¹⁹ 埃弗斯利(Eversley)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指出:在1770—1779年这一“关键时期”,对外贸易部门的衰落是“不容置疑的”,而同时期的工业化进程却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加速度”,这进一步加强了“为大量生产消费品所需广阔的国内市场”,是实现工业化的核心的论点。²⁰ 霍布斯鲍姆认为,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只能是对外贸易和广阔的国内市场这两个因素的结合,此外还要加上“第三个经常被人们忽略的因素:政府”。²¹

有人对需求的显著增长表示怀疑。相反,他们强调,“和工业化进程有联系的是供给,不是需求”。²² 在一些人看来,资本供给早有明显的反映。1942年,汉密尔顿(Hamilton)以18世纪后半期由于工资滞后,即物价上涨与工资提高之间的差距所引起的“利润膨胀”,来解释工业革命的“革命性”特征。²³ 在此之前,汉密尔顿就曾站在这种传统的立场上解释过16世纪经济扩张的原因。²⁴ 艾什顿(Ashton)认为,由利率下降导致的“资本相对廉价”²⁵ 是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30年后,经过对有关资本构成问题文献的重新审视,克鲁泽(Crouzet)以较为温和的立场采纳了艾什顿的观点:资本的“相对充裕”是引起工业革命的一个“有利因素”,但它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必然条件,不过是18世纪出现在英格兰的一个历史事实而已。²⁶

难道固定资本真是重要因素吗?越来越多的怀疑论者争辩说,“早期工业化时期对资本的需求是有限度的”。²⁷ 面对种种诘难,资本重要论的拥护者们由于证据不足,退到了较为稳妥的立场。“归根到底,值得予以考虑的与其说是资本的存量……不如说是资本的流动”。²⁸ 该论点的一个变通观点认为,起重要作用的不是资本存量的“相对规模”(即“相对于国民收入”的规模)的变化,而是“资本存量内涵”的变化,即投资“由资本积累的传统方式向资本积累的现代方式”的转变。²⁹ 强调资本流动的作用马上把人们引向对信用机构的关注。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大不列颠之所以不

同于其他国家，恰恰因为它拥有大量的有助于工业发展的信用机构。³⁰当然，这种观点是把资本投资限定在新开发领域。然而，卢西（Lüthy）相信，早在18世纪中期，西欧和中欧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便于金融交易和资本流通”为特征的“交换区域”，他并且指出，阻碍资本流通的因素此时已荡然无存。³¹

另一些作者十分重视人口流动的作用。人口增长既可以增加对工业品的需求，又能为工业品的生产提供劳动力。不列颠“前所未有的口增长”³²尤其引人注目，因为它不仅是持续的、长期的，而且与产出的增长保持一致。³³普拉姆（Plumb）对这一怪论作了补充，他认为，人口增长的关键因素，是在“中产阶级中下层”的家庭中孩子的成活率提高了，因为，“如果没有一个人数急剧膨胀的受过足够的教育和技术训练的中产阶级下层，就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³⁴

然而，有两个问题必须提出来：真的出现过人口革命吗？引起人口增长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又涉及到人口增长究竟是经济变化的原因，还是经济变化的结果）是否真的出现过人口革命这个疑问，也意味着必须要回答下面两个问题：人口的“革命性”变化与此前及以后发生的什么事情有关？英格兰（或大不列颠）人口增长模式与法国或其他地区的人口增长模式有什么显著不同？如果我们假设一个表示人口增长情况的对数曲线，就会发现，那些执意要把18世纪晚期作为某种程度上是独立的一段，标示出来的作者，是没有任何理由这么做的。³⁵的确，18世纪后半期的人口增长率高于前半期。但一直有人认为，正是前半期而非后半期的人口增长才是一个例外。例如，塔克（Tucker）以英格兰人口增长为例，指出“整个18世纪，英格兰的人口增长并不像依据长期发展趋势，使我们预期的那样多”。³⁶莫里诺（Morineau）通过对法国人口增长情况的分析，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所以，18世纪晚期的人口增长称不上是革命性的，相反，把它看做为“一次人口革新，一次人口恢复或复原”可能更合适些。³⁷米尔沃德（Milward）和

索尔(Saul)反而提出了完全有利于法国的论证。他们认为,法国人口增长模式是独特的(因为法国的人口出生率在死亡率降低以前或与之同时,也下降了)。“但在19世纪的发展中,人口的缓慢增长使人均收入的增加比较容易实现,这就为法国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不是不利条件”。³⁸

然而,即使人口增长(这是毫无争议的事实)不被看成是革命性的,即使它并不一定是英国特有的现象,“问题的核心”³⁹仍然在于,人口的增长是否是经济社会变迁的结果,或者恰恰相反。就像哈巴库克(Habakkuk)说的那样,“难道是工业革命创造出了它自身需要的劳动力吗?”⁴⁰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看一看究竟是人口死亡率下降,还是人口出生率上升才是人口增长原因的争论。对大多数分析家来说,似乎很少有人对死亡率下降是人口增长根本原因的观点表示怀疑,原因很简单,“在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的情况下,通过降低死亡率而不是提高出生率,更容易使人口增长”,⁴¹当然,如果出生率和死亡率都低,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

当时的人口死亡率为什么会降低呢?既然高死亡率“主要归因于高发性的传染病”,⁴²那么,死亡率的降低就存在三种合乎逻辑的解释:医疗条件的改善(免疫法或疗法);人们对感染抵抗力的增强(环境改善);细菌和病毒的毒性降低。如果死亡率是由于多种疾病同时并发情况(这种情况看来是一直存在的)的减少而降低的,第三种解释就可以排除,因为把所有疾病全部归因于“(致病性的)有机体特性的偶然变化”⁴³,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此我们只限于探讨真正有争议的问题:关于医疗条件或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善问题。长期以来,医疗条件的改善一直是最容易被人们接受的一种解释。现在仍然有人坚持这一观点,他们把“18世纪时为防治天花而引入和采用的疫苗接种法”,⁴⁴作为死亡率不断下降的最合理的解释。人们对此作了仔细而富有说服力的论证:直到20世纪以前,医疗条件对死亡率的影响一直是微不足道的。所以,

很难用医疗条件的改善来解释 18 世纪人口的变化。⁴⁵ 由此看来, 留给我们的只有以下的结论: 一定是“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改善”引发了人口的膨胀, 而不是由于人口膨胀引发了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改善。⁴⁶

里格利 (Wrigley) 和斯科菲尔德 (Schofield) 在他们的英国人口史巨著中, 把生育的作用视为主要的促进因素。他们认为, 单身率下降导致了生育率的提高。这一论点与他们的一个模式联系在一起, 在这个模式里, 可获得食物的不断增加是建立家庭可能性的关键因素。他们对很长一个时期 (1539—1873) 的人口变化进行了研究, 结果发现, 除其中很短一段间隔期 (1640—1709) 外, 生育率、死亡率和结婚率都提高了, 但生育率始终高于死亡率。据此, 他们似乎要论证一个长时段的英国人口史模式。然而, 他们同时又希望证明, 在 18 世纪早期至 19 世纪晚期这一时期里的某个阶段, 英国人口的“预防性制动周期” (Preventive - check cycle) 和人口规模与食品价格之间的联系被破坏了。⁴⁷

里格利和斯科菲尔德的观点除逻辑上自相矛盾 (长时段模式解释与模式中断解释之间的矛盾) 外, 他们强调结婚率上升和/或者下降是经济“起飞”原因的观点, 也因哈吉诺 (Hajnal) 全然相反的论证, 而需要进一步进行修正。哈吉诺认为, 18 世纪前半期, 西欧 (注意: 不仅仅是英国) 存在着一个包括实行晚婚和存在大量单身者的独特婚姻模式。哈吉诺发现, 正是这种较低的生育率模式 (它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通过“促使资源转移达到极限, 而不只是维持最低生计的程度”, 才促进了经济发展。⁴⁸

最后, 还有一个人们不常谈及, 但可能更为重要的人口流动因素, 即欧洲处于乡村边缘区的人口不断向城市和工业区转移。当然, 这是就业机会增加和交通设施改善的结果。⁴⁹

近年来, 强调农业部门发生的变化, 是引起工业部门发生变化的前奏和决定性因素的观点, 日益受到人们的注意 (对当代边缘国家的政策指导中就包含着对农业部门的强调, 这种强调与人

们对农业部门的关注日益增长无疑是有联系的,而且人们往往明确地表明了这种联系)。除了工业革命和人口革命,现在我们转向对农业革命的探讨和解释。这可是个大话题。首先,我们必须记住,即使是在大不列颠,甚至在整个 19 世纪前半期,“农业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产业”。⁵⁰ 所以,如果确曾发生过经济革命,特别是确曾发生过农业革命的说法有所指的话,那它一定是指在某个地方肯定出现过总体性的产量提高。我们立刻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说的产量是指每公顷耕地的产量(这也指每粒种子投入的产量,每个劳动力投入的产量,或人均产量),还是指全部产量?在 18 至 19 世纪这 100 年里,欧洲世界经济体就总体而言,农业产量一直在增加,似乎很少有人对此表示怀疑。⁵¹ 然而,如果的确存在部分劳动力从农业生产部门转向其他生产部门(特别是转向工业生产部门)的现象,那么,可以这样认为,或者是每粒种子的投入产量提高了,或者是每个劳动力投入产量提高了(加上耕地面积的扩大)。⁵² 此外,如果总体生活水平确曾得到过改善,那么人均产量肯定已经提高了。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去推究,为什么人均产量的提高,需要伴随着每粒种子投入产量的提高,或每个劳动力投入产量的提高,因为在世界经济体扩张时期,后面两个因素都是很明确的。

难道只有农业工具的机械化才能使产量提高吗?尽管铁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耕犁(还有用于马匹的马蹄),⁵³ 但很难证明 19 世纪以前有明显的农业机械化。⁵⁴ 农业上的进步,主要是通过利用饲料作物带来的土地耕作的进一步集约化取得的。⁵⁵ 主要有两种耕作方式:轮耕(alternate husbandry)[当时人称之为“诺福克制”(Norfolk system)]和变换耕作(convertible husbandry)[或称牧草耕作(ley farming)],上述两种耕作方式都因下面情况而使休耕地(fallow)失去了存在的必要,直至最终被取消:一是块根作物(芜菁、马铃薯)的种植,使杂草得以清除;二是牧草(苜蓿、红豆草和裸麦草)的种植,可以增肥土壤。⁵⁶ 作物的连续收获也解决了牲畜冬季的饲料问

题,牲畜提供的肥料又可用于补充土壤肥力。

以上两种耕作方式都不是新生事物,只是在18世纪晚期得到了广泛的推广。毋庸置疑,这些耕作方式在英格兰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可否因此就把英格兰的情况说成是例外,却令人怀疑。斯利彻·范·巴斯(Slicher Van Bath)指出,面对较高的小麦价格,1750年以后,西欧“普遍从三圃轮种制转向变换耕作”。⁵⁷但饲料作物种植推广的新颖之处却在于,提高耕地产量不像以前那样是以牺牲牧场为代价的。⁵⁸

即使是这样的进步,如果按人均产量分析,也一直受到莫里诺的挑战。莫里诺认为,只是在19世纪中期,产量才出现了显著提高。⁵⁹他认为18世纪晚期的农业“进步”虽然比以前有所前进,但还是遵循了一种“贫困的逻辑”。他认为,耕作的改良往往与生活水平的下降同时出现。生活水平的下降伴随着食物短缺,而耕作的改良则“促进生计的维持”。⁶⁰莫里诺是根据法国的资料作出上述分析的,而且他也同意英格兰的自然条件比法国具有某些优势的说法,但他又对英格兰甚至在1835年以前“生产率就有了实质性提高”的观点表示了怀疑。他指出:

西欧经济的起飞,并非植根于一场“农业革命”。即使是在英格兰,难道“农业革命”这个概念,适合于解释那种遇到第一场严寒就被吓退了的梦幻似的进步吗?⁶¹

即使耕作技术的变化没有直接引起人均产量的急剧提高,难道建立在土地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还不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因素吗?因为,一方面,这些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劳动力(通过提高每个劳动力投入的产量,允许部门间劳动力的流动,或者通过提高总产量,允许人口膨胀);另一方面,这些变化也最终促进了每粒种子产量的提高,并成为这场技术革新的前提,或者说两方面的影响兼而有之。简言

之,难道圈地不是整个工业化进程中的关键因素吗?

有关圈地问题的讨论,涉及到三个彼此间并无必然联系的独立过程。一个是“敞地制”⁽¹⁾的取消。敞地制度使个体经营的耕地,在收获季节之后到播种季节之前这一期间成为公共牧地。第二个是“公共权利”的废除。该权利允许人们共同平等使用属于庄园领主土地上的公有地,或允许人们共同平等使用“荒地”(所谓荒地是相对耕地而言的)。以上两种变化都削弱或干脆排除了那些地产很少,甚至没有地产的人饲养家畜的能力。第三个变化是使分散的地产集中起来,这对实现规模经营是十分必要的,敞地制和公共权利的终结使之成为可能。

圈地通过扩大土地经营单位和对那些饲料作物的种植,以抵制“自由骑手”的保护,⁶²可能使混合耕作更加有利可图。地主的主要目的是获取“通过圈地和地产集中促成的技术革新,所带来的上涨租金”。⁶³然而,圈地事实上是否使产量提高,这个问题还不太清楚。钱伯斯(Chambers)和明格(Mingay)称,圈地是大幅度提高产量的“至关重要的手段”,尽管如此,他们也承认,有关18世纪英国圈地与产量情况的依据至多是“间接性的”。⁶⁴奥布赖恩(O'Brien)对此深表怀疑地说道:要说1750—1815年间大规模圈地,“对产量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影响”,那就“没有比猜测更容易的了”。⁶⁵

固然,早在1750年以前圈地就已经开始了。在圈地过程中,英国议会扮演的新角色加快了圈地的步伐和可见度。⁶⁶正是这种政治干预表明了圈地发展的“规模之大”。然而认为只有英国实行圈地是错误的。布洛赫(Bloch)作过仔细研究,证明法国也以不同方式实行过相当规模的圈地,而且,1730年以后法国圈地的速度也

[1] 敞地制(Open-field System),欧洲中世纪盛行的一种不设篱笆敞开公用的土地利用惯例,庄园、村庄的非耕地、休耕地都是敞开的公用地,村民都可以去放牧或樵猎。耕作地在收割之后和播种之前也不许设篱笆或栅栏,敞开公用。圈地和土地私有化后,敞地制逐渐废除。——译者

加快了。⁶⁷事实上，布洛赫所说的“土地所有权的个人主义化”（agrarian individualism）的相对扩张，是18世纪整个欧洲的现象。⁶⁸如果说圈地运动在大不列颠而不是在欧洲大陆取得了更大的成功的话，那么这种差别显然在于英国强大的国家机器，为大地主提供了武器，而法国大地主无论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前还是以后，都没有从政府那里获得过那样的支持。⁶⁹

由于土地分散持有具有历史传统的力量，单纯的圈地（用篱笆把土地围起来）是不够的。与圈地一样，地产的集中归并和随之而来的小农（无论是土地持有者，还是佃农）的衰落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是18世纪这一过程可能在不列颠和法国都加快了。⁷⁰然而，地产集中是否真的使产量显著提高，一直是估计多于实证。⁷¹

最后，有一种观点认为，农业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导致一些人从土地雇佣关系中被排除出去，他们随之成为城市和工业劳动力的来源。照此说来，同样可以把农业革命视作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例如，道布（Dobb）指出，18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圈地，“使大批茅舍农从他们邻接公有地的最后一块条状地上……被赶走了，……时间恰好与工业扩张进入一个新时代不谋而合”。⁷²这一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论点一直是备受指责的对象：圈地过程表现出的暴力和压迫程度到底有多大；⁷³到底有多少人流离失所。⁷⁴后一种指责包含两重意思：一方面是说新的耕作方式，“对劳动力的需求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多了”；⁷⁵另一方面，如果农户比率减少，工业人口增加似乎是不争的事实，⁷⁶那么增加了的城市劳动人口的来源只能用人口增长来解释。⁷⁷当然，这两种论点——暴力驱逐说和人口过剩说——并非相互抵触。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两种说法与不列颠例外论的对立。如果是人口增长导致城市劳动力膨胀，那么所谓的18世纪时大不列颠拥有的特殊优势又在哪里呢？如果以暴力驱逐说解释不列颠的优势所在，我们又该如何去解释欧洲大陆并无工业劳动力短缺的证据呢？⁷⁸正像法国人喜欢说的那样：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不列颠工业革命的后果与欧洲大陆工业革命（即“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后果不同——那就要从大不列颠具有某一个或某一组特殊因素来解释；或者是工业化进程更具有普遍性，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们更有必要仔细考察两者的后果有多么的不同。退一步说，即使认定农业革命先于工业革命，结果也是一样的。如前面已提到的那样，我们会发现自己面临着两个问题：这种现象发生到什么程度；大不列颠的不同程度到底有多大？

我们曾在前面提到过，莫里诺绝不相信法国在18世纪出现过农业革命的说法。人们普遍认同有关英国农业情况的说法，也同样受到了克里吉猛烈有力的抨击。克里吉认为，农业革命发生的时间早得多，是在16和17世纪，“18和19世纪农业上的进步，从它实际有限的规模来看，重要性已落后于工业革命和交通运输革命”。⁷⁹然而，奇怪的是明格（他是克里吉的主要攻击对象之一）在机敏地反驳克里吉时，为了挽救农业革命发生于18世纪晚期的观点，竟然把18世纪晚期当作农业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农业革命从17世纪晚期开始，一直持续到19世纪，“是一个持续时间很长的、逐步推进的技术和制度变迁的过程”，⁸⁰这个观点大大削弱了将“革命”划定在某个确定时间的立场。

对于认为18世纪西欧整体上发生了农业革命的看法，多夫林(Dovring)同样提出了疑问。他也发现，当时农业并没有出现“在规模、速度与工业革命有任何相近之处”的变化。尽管如此，他还是对我们为何一直相信，不列颠当时曾出现过农业革命提出了一个简要的解释。他认为，当时不列颠的农业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只是这些变化较之发生于欧洲大陆上的变化“得到了更好的宣传”，所以，“正是这一点，再加上对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所作的颇为诱人的类比，可能使我们夸大了事情原本发生的程度”。⁸¹

如果以英国的人口特征和农业情况，解释工业革命的原因难以使人信服，在这里还可以提出一个颇有分量的解释：英国文化，或者说是蕴含于英国文化中的某种可以说明为什么英国有一种

更强烈的企业精神的因素。用国民性格这种循环推理方法作解释多少有点虚无缥缈，所以还是让我们从所谓的文化性格在制度上的表现来加以考察：英国有一个更为宽容的国家结构（它是历史形成的，并被认为是文化驱动力的结果）。

正统的观点——如果允许我们如此称呼的话——认为，大不列颠工业革命是“自发的，没有得到政府的扶持”，⁸²或者说得更重一点儿，“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帮助”。⁸³有些人则不那么武断，他们倾向于承认政府在建立“市场环境”方面发挥的作用，认为建立市场所需的一些前提条件，诸如政治上的稳定、行政上的统一、普通法、支持商业利润的态度等，都是由政府创造出来的。例如，苏普莱（Supple）总结说：“在工业革命初始阶段，政府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是间接性的”。他还进一步补充说：“然而，事实始终表明，这种作用只是间接性的”。⁸⁴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一下，所谓的 18 世纪时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特别是相对于法国而言），英国政府奉行了自由主义政策的观点，我们就会得出两个论点：英国政府管得少，收税少。然而，英国议会在圈地上所起的主要作用，无论如何不能当作国家不干预经济的一个例子提出来。实际上，英国政府在农业方面起的作用，已经超出了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法令规定，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或许有人提出，这种法令规定的目的在于消除习惯束缚的羁绊，但更清楚的是，这种法令规定不仅仅涉及到在法律上允许市场交易的简单立法，它同样还起到了消除各种行会限制市场交易的作用。这再次证明政府对经济干预的重要性。实际上，米尔沃德和索尔向我们提出了另外一种一般性的假说，即欧洲就整体而言，“1750 年以后，哪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力量最强大，那里的各种行会和社团的力量就最微弱”。⁸⁵再次证明政府作出法令规定的目的，可能就是要保障市场自由。

然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有更为直接的，只不过是这种干预在世界市场上的表现多于在国内市场上的表现。在大不列颠，